

巴拉克劳的史学观点

与对欧洲历史的末世感

吴于廑

一

近二三十年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征，这就是从前一世纪以来的对于欧洲历史那种强烈的、乐观信念的丧失。

十九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开端于朗克学派，这个学派在德国和英国留下特别深远的影响。朗克学派最吸引人、也是最能蒙蔽人的地方，是它主张史料的全面占有和对史料的客观批判。朗克 (Leopold Runke) 本人是最先为资产阶级史学揭开西方各国档案材料的历史家。他在西方史学界所以享有不可一世的声名，主要是由于他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标榜从客观史料写历史、重视史料的析疑辨诬，有一套看来是颇为严谨的家法。在他早岁成名的“罗马及日耳曼民族史”那本书里，就已附有对于史学和史料的批判。朗克说，“历史是怎么个样子，就只能怎么样叙述”。这句话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客观主义”和“科学态度”的概括。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方法论上的外衣；在外衣的下面，还掩藏着一个根本的、而且从朗克及其学派看来是不待论证就可以自明的历史思想。在朗克的心目中，“欧洲历史”——实际是西欧历史，因为朗克一贯蔑视东欧历史——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结合。所谓一致性，是说欧洲历史乃罗马和日耳曼民族因素的糅合，其本身是一独特的世界；除了这个世界，朗克的史学也看不到有其它任何世界。所谓多样性，是说构成这个罗马·日耳曼世界的，是若干各为一单元的民族，即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和斯干的那维亚等族。前三者为拉丁，后三者为日耳曼，朗克合称之为“六大民族”。朗克的史学体系，把欧洲历史看做是一个蕴蓄着巨大潜力的实体。如果没有“六大民族”的多样性，没有它们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对立和抗衡，欧洲历史的潜力就无从发挥，也就不会有欧洲的近代文明。因之“六大民族”的彼此竞争，是欧洲历史的枢纽。竞争着的“六大民族”，很自然地形成一种权力均衡。这种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均衡，好象是一付具有自动调节功能的机械。它阻止其中任何一国称霸于欧洲，因而可以使欧洲历史的多样性保持不坠。保持了多样性，也就保证了具有一致性的欧洲历史的发展。从朗克看来，自中世后期日益形成起来的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体系，就是这样一个自然完整、不可破败的体系；这也就是历史迄今到达的最高点。朗克的重要历史著作，其所以集中于十六至十七、八世纪这段时期，一个不言而喻的理由就是因为在这三个世纪里，西欧各民族国家的所谓权力均衡，正由形成、发展而底于完整。朗克在晚年，还口授一部七卷本的世界通史。在这部通史里，他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是一线发展。古代埃及和前亚诸国，被认为是这条线上的一些无足轻重的附加

物；而从希腊到他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近代欧洲，才是这条线上的主流。所以把朗克的晚期和前期著作汇合考察，就可看出在他的所谓“客观”史学方法的隐蔽之下，他对欧洲历史的过去和将来，抱着一个如何强烈的主观信念。

朗克的历史权力均衡论，实质上是把哲学上的机械唯物主义搬用于历史。然而正如牛顿物理学相信依照规律运转的物质世界是出于一个超自然的万能匠师，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相信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有规律地自我调节是因为在它的后面有一个“不可见的手掌”，朗克也相信他所发现的由一线发展到近代顶峰、并又依靠权力均衡的机械作用而永存不灭的欧洲历史，是上帝意旨的产物。他侈谈所谓“客观理念”、“在上的权能”、以及“上帝居住、生活、并见于一切历史之中”。他把一切历史上的人物和民族——实际是指西欧各族——看做是受託于一个玄秘的世界运动。[●] 他的这些说法，看来好象和他强调客观批判的史学方法很不相容。然而在西方思想史上，这是毫不足怪的现象。机械唯物主义完全可以和反动神学结成婚配。朗克的史学体系，恰恰就是受胎于这一不伦不类婚配的血裔。正因如此，朗克对于欧洲历史的强烈而乐观的信念，才在西方史学界既有“科学”的标签，又有神学的支柱。这个信念支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几乎有一个世纪之久。

但是从本世纪的二十年代起，在朗克学派支配下的正宗之外，渐渐出现了异议。首先是德国的斯朋格勒(O. Spengler)，稍后是袭斯朋格勒之说而又自成一体的英国汤因比(A. J. Toynbee)。斯朋格勒断言西方的历史即将没落，并以这一论断作为他的书名。汤因比基本上接纳了这一论断，并且大加发展，指出一向为西方史学界奉为人类历史中心的欧洲历史——汤因比称之为“西方文明”或“西方社会”——不过是众多的、按同一周期规律而生长衰谢的人类文明之一而已。斯朋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思想，不是偶发的东西。它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朗克史学，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阶段在历史学领域里的不同反映。关于这点，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斯朋格勒和汤因比的著作问世之初，儘管在一般读者中颇为耸听，但正宗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却认为他们所说的不是历史，是所谓哲学；而哲学在资产阶级的学朮里是可以各执一词的，讲究“科学”方法的正宗历史学家可以不必置理。因此他们相处晏然，依旧爬剔他们的史料，讲他们的欧洲中心、权力均衡和一线发展，到了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史学界的情况可就迥乎不同了。曾经被目为非正宗的汤因比，固然是声名日噪，随者日多，就连那些正宗史学家也开始对自己的基本信念怀疑，提出要重新估计欧洲的历史。在这些人中，英国中古史家杰·巴拉克劳(Geoffrey Barraclough)看来是一个有力的发言人。他在战后所写的论文，已经彙为一集，题为“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 这本文集不仅提出他自己的观点，而且也反映其他西方史学家的类似观点。这些观点显然都带有同一的特征，这就是反对支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将近一个世纪的朗克式的对于欧洲历史的信念，不再奉之为天经地义的道理。西方资产阶级学朮思想的一种濒临末世的忧思，以及由这种忧思而带来的失望、彷徨和微弱无力的探索，都在这些人的史学观点里得到鲜明的反映。

- 关于朗克的史学方法和史学思想，参看：J. W. Thompson,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卷二，頁168以次；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頁76以次。
- G.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1956, 共收論文十五篇。

二

巴拉克劳是深受德国史学传统影响的西欧中古史家，过去所走的道路也就是朗克所开闢的道路。在他的文集里，虽然仍称这条道路为“常軌”，但他已经感到这条常軌行不通，如果不改途易轍，西方史学就无法对待第二次大战以后的欧洲和世界形势。巴拉克劳說，启发他認識西方傳統史学局限性的“第一个暗示”，是由于他“察覺过去所学的历史，使他完全没有准备来面对一个东欧各国註定要发生更大作用的世界”。他认为“一九四三年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迫令欧洲历史必須全部改写”，而他在英国和德国所受的史学教育，却使他“除因有关西方外交而为众所周知的几点而外，在为一切的实际效用方面，对东欧的历史是一无所知”。他“讀过日耳曼先知圣邦涅发斯 (St. Boniface) 所有的遺書，但是關於斯拉夫先知圣舒里尔 (St. Cyril) 和圣米梭迪厄斯 (St. Methodius) 什么也沒有讀过”。他由是“开始怀疑过去受其熏陶并以为理所当然的史学可能远不是真理，而是反映一个特定时期或一特定地区对于前途展望的一偏之見，其真實性已为后来发生的事件所动摇”。他也怀疑象这样的旧史学对当前的世界究有何补。西欧中心論既已为历史事实所推翻，从东欧崛起的新力量，已使西方史学自朗克以来所建立的体系无立足之地，于是巴拉克劳不得不痛切陈詞，主張历史学家必須“重新定向”。^①

巴拉克劳的所謂“重新定向”，是对前一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傳統史学的全面異議。湯因比在評述巴拉克劳的文集時說，“这里有足够的炸藥，把十九世紀的西方历史主义爆裂为灰烬”。^② 这样过分誇張的評語，固然未必尽是，因为作为資產階級的历史学家，巴拉克劳不可能完全脫去西方傳統史学的窠臼；但是在历史是否一綫发展、西欧是否为历史中心、何謂欧洲历史、欧洲历史如何发展、其前景怎样、旁及用什么态度对待历史等問題上，巴拉克劳对傳統史学的異議确实具有全面否定的性質。最近，巴拉克劳已经成为湯因比“斯蒂芬生国际史研究講座”的繼位人。虽然他在过去批評过湯因比的學說，^③ 而且即在这冊論文集里也还有若干地方不同意湯因比的見解，但是在整个思想趋向上，他无疑是受了湯因比的影响，并且与之結为反对傳統史学的同盟。他的所謂“重新定向”，就是在这一影响下要西方史学作全面重大的轉变。

我們可以从巴拉克劳对历史发展一綫論的看法說起。在朗克的生前及其后，西方資產階級学者对人类学、考古学以及古代各国历史、特别是西南亚洲古代历史的研究，有过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和发展。这些新的历史知識領域的开拓，如以对朗克而論，几乎没有发生影响。朗克的一綫，仅仅是从古典时代到所謂拉丁与日耳曼民族交融的欧洲的一綫。他对生前所可

① G. Barraclough, 前揭書, 頁8—10。

② 湯因比的評語被引述在巴拉克劳文集的書皮上。西方資產階級史学中的所謂历史主义，是“把现实作为一个精神形成的历史过程来加以估价” (Guido de Ruggiero 語)，亦即对十八世紀福緣泰尔等人唯理主义世界觀的反响。这种历史主义把历史視為人类精神創造能力取得成就的无尽过程，強調历史发展的稳定的連續性及对历史現象不可能作是非判断的相对主义。巴拉克劳在書中2—7頁提出他对这种所謂历史主义的批判。

③ M. F. Ashley Montagu, Toynbee and History, 頁118—121。

见到的关于欧洲地区以外的历史研究，都视若无睹。但自朗克以后，西方史学中的一线发展论就远比朗克的范围广泛；晚近新获得的历史知识，几乎被全部包罗在内。根据这样大为扩充了的一线论，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机器时代，全人类的历史都是一脉相沿。个别国家或民族的文明可以有起有伏，全人类的历史却总是前代的成果为后代所继承，因之每出愈高，进步之后再进步，高峯之后复高峯，而晚出的西欧文明，则是汇合过去一切文化成就的顶点。这种乐观的、自信的一线论，弥漫于十九世纪后叶及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史学界。英国费边主义者威尔斯(H. G. Wells)在一九二〇年发表的“世界史纲”，就是这一思想最典型而通俗的代表；十五年后费席尔(H. A. L. Fisher)的三卷本“欧洲史”，也是在思想体系上属于同一的类型。巴拉克劳反对这种一线发展论。他指出一线发展论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凭藉，“其主要错误在于从自然科学到历史科学、从自然史到人类史运用虚假的类比”。他说“把人类藉以胜过恐龙、鱼龙和超越爪哇直立猿人的质素，视同使我们在共同生活于文明社会中得以向前进展的质素，这是既未证明、亦不可证明、甚至也不是或然的”真理。进化论所能说明的只是人作为自然动物的演进，却不足说明人作为社会动物亦即文化生活创造者的演进，^①他又否认物质进步是衡量历史发展的标准。那种把历史划为铜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的分期法，他以为必须抛弃。按他的看法，如要说明历史是否一线地、累积地前进，必须证明“不同世代的聪明才智之士的正确见解是否不断递加”，并最后达于完美。然而一涉及此，他说，历史学家就“堕入危险的深渊”。他以艺术史为例，说“公元前十八世纪阿拉拉克王耶里姆—列姆(Yarim—Lim)的头象，普拉昔提里(Praxiteles)的赫姆斯(Hermes)象以及拉斐尔(Raphael)的西克特斯教堂圣母象(Sistine Medonna)并不构成导向艺术完整的连续发展中的各个阶段，而是赫梯的、希腊的、欧洲的不同文明的各自表现”。^②既然历史上艺术家的思想不是连续地、累积地发展，依巴拉克劳的逻辑，“一切聪明才智之士的正确见解”也必然不是连续和累积地发展，而历史上先后兴起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也就不可能是一线相沿，后来居上。这样，他就否定了近几十年流行于西方史学界中的一线论。

不特如此，即使象朗克那样把历史的一线发展局限于古典历史和日耳曼人入侵后的欧洲历史之间，巴拉克劳也同样反对。他说：“在公元后三世纪的罗马，古典的精神已经息灭了……蓬勃于六个世纪以前的、令人称羡的理性探究精神，已经让位于迷信和神秘教义……代表教会的忒图里安(Tertullian)、吉鲁姆(Jerome)、圣·安布鲁斯(St. Ambrose)、圣·奥格斯丁(St. Augustine)都充满对罗马传统的反对”。^③中世纪的僧侣，尤其不理解古典时代的思想。至于文艺复兴，巴拉克劳认为一般以之为古典文化重生的说法也不足为信。他说，“希腊罗马的思想，诚然是对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心理的一个外来的刺激”，但是人文主义者并没有真正重新发现和接受古典时代的精神遗产。文艺复兴时代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它是对于已被改写的和常常误解了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诠释……。”^④于是“聪明才智之士正确见解”不能累积发展的论据在这里再度运用，而巴拉克

① Barraclough, 前揭书, 页226。

② 前揭书, 页228—231。

③ 前揭书, 页36, 37。

④ 前揭书, 页229。

劳也就獲得結論，在古典文明和近代欧洲文明之間，同样不存在着一綫发展的問題。

巴拉克劳的这些說法，一望而知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也浸透在下文即将論到的他对其它問題的觀點。他在批評一綫論时，其所以反对把物質的进步作为衡量历史发展的标准，目的就在于踢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把历史仅仅看做是人的思想意識的历史。因之他的各种論証，无一不是从艺术史和思想史取材。關於这些，是不待批判就可以知其謬誤的。就本文而論，我們現在注意的中心是他对西方傳統史学中一綫发展論的否定。否定了这种一綫論，也就否定了附着于其上的把近代欧洲文明視为人類历史发展頂峯的信念。在西方資產階級史学上，这无疑是极可注目的变化。

巴拉克劳在何謂“欧洲历史”或“欧洲文明”這一問題上，也反对自朗克以来的傳統觀念。朗克心目中的欧洲历史，前文已經說过，就是西欧的历史。在他認為体现欧洲历史所謂多样性的“六大民族”之中，就沒有东欧各族。湯因比虽然反对西方的傳統史学，但仍然把西欧历史看做是一个独特的实体，和东欧历史截然不同。巴拉克劳对于这类从欧洲历史中排斥东欧的說法，在好几篇論文里都提出反駁。他首先怀疑西欧历史有什么一致性的傳統。通常指为西欧历史傳統的东西，他認為都經不起分析。古典文化早在公元三世紀就已熄灭了。中世紀的教会远沒有保存古典时代的学朮，拉丁語也从未在中世紀成为通用的語言。直到十三世紀，許多教士連用拉丁語文写成的弥撒禱文都不会解釋，对古典著作的知識更不問可想。中世紀的帝国和教会，也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樣，可以看做是象征西欧一致性的傳統。伯萊士(J. Bryce)在“神圣羅馬帝国”一書中所闡述的主題，在今天已經沒有被接受的价值。巴拉克劳指出——应当說，他在这点上是正确的——中世紀的統一帝国和教会，从来沒有成为历史的真实；把關於帝国的理想和中世紀“西方历史上的帝国加以等同……只能是堆集混乱”。^① 历史上的中世紀西方帝国，从来不是羅馬統一帝国的繼承者。不論是九世紀查理曼或十世紀奧图所建立的帝国，都不包括西欧全部。同样，中世紀的西方教会，在实际上也沒有真正統一过。当时的英国教会(ecclesia Anglicana)和法国教会(ecclesia Gallicana)，都不是沒有內容的、只有地理意义的名詞；所謂天主教会的統一性，也自然是虛相。^② 因此，巴拉克劳說，把西欧历史看做是有其独特的、并足以表明其異于东欧的一致性的傳統，只能是一种可疑問的、未經历史証实的假定。

即使退一步說，西欧有它一致性的历史傳統，而这些傳統又恰恰是从羅馬承襲而来的古典文化、帝国制度和中世紀特別发展的教会制度，那么，巴拉克劳認為，这些也都不是西欧所特有的东西。在东欧，它們不仅同样存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比西欧的有更多的影响。那些主張西欧教会保存了古典文化、其帝国繼承了羅馬帝国、并又构成西欧的特有历史傳統的人，显然是忘記了东欧有一个东正教，还有一个和羅馬帝国直綫相承的拜占廷帝国；而羅馬的文化和羅馬的国家組織，虽然歷經改变，却在东欧一直延續到公元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仅如此，即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这个羅馬的傳統也沒有从东欧絕迹，因为“俄国的君主被称戴为新君士坦丁……莫斯科驕傲地号为第三羅馬”。当时一个僧侶斐罗特阿斯(Philotheus of Pskov)曾这样宣称：“两个羅馬已經倒下去了，但是第三羅馬却

① 前揭書，頁129。

② 前揭書，頁44。

屹然耸立，将来也不会有第四罗马。”^① 这显然反映在中世纪的东欧，罗马及其帝国的傳統留下如何深刻的影响。所以巴拉克劳认为，如以这些傳統为論据，則东西欧的历史并无不可逾越的鴻沟。在题为“俄国与欧洲”那篇論文里，巴拉克劳又历述在文化和外交上俄国和西欧之間不可分割的关系。^② 他强调彼得大帝的改革是接受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文化，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又是以源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自一千多年以来，在宗教和文学方面、在艺术和全部思想领域方面、正如在经济接触和政治关系方面一样，西方和俄国人都从互相授予的过程中共需惠益，因而也丰富了欧洲文明的共同积累”。^③ 至于朗克所提出的种族論点，亦即欧洲历史乃罗马和日耳曼民族因素互相汇合的論点，巴拉克劳认为也不足把东欧的斯拉夫民族拒于欧洲历史之外。他指出，在朗克所說的日耳曼諸族之中，斯堪的那维亚民族就没有与罗马因素混合，然而这并无碍于斯堪的那维亚諸国历史成为欧洲历史的构成部分，也无碍于斯堪的那维亚民族成为今日文明的欧洲民族之一。巴拉克劳把欧洲历史比喻为一个“共同的联合”，不同的欧洲民族在不同的时期里参加。斯堪的那维亚民族虽然参加較晚，但这一点完全无关紧要。^④ 准是而論，則对于斯拉夫民族，就没有任何可以推之門外的理由。他說，从十五世纪末叶伊凡大帝时代起，俄国和西欧的关系就已经密切；到了十八世纪，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更其“肯定地是欧洲各国体系的一个部分”，那时的俄国没有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欧洲没有俄国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巴拉克劳不仅否定朗克的想法，同时也否定斯朋格勒和湯因比的想法。他认为把东西欧的历史分为两个不同的实体，只能是“武断的假設”。^⑤

由上所述，可知巴拉克劳所說的欧洲历史，既非一綫发展的人类历史上的最高阶段，也不是只包括西欧部分的一个片面。巴拉克劳认为欧洲历史是一个完整的、自成一体的东西，既不同于希腊罗马，亦不同于中国、印度或其它的历史。这个自成一体的欧洲历史，在他看来是有其独特之处的，而且也有其发展的步骤。所謂独特之处是什么，巴拉克劳說得不很明白。在一个地方，他說欧洲的特点是“在各个方面的巨大技术进步”，但他隨即又說，“文明不只是蒸气引擎和电報，也不只是噴气机和氢彈……文明的真正有关紧要的問題，在于它所表现的道德价值”。^⑥ 在另一些地方，他又不止一次地引述斯朋格勒所說的西方文明的理想。斯朋格勒称这个理想为“无限空間”，巴拉克劳則引伸为“不可比拟的人的精神的高举”，这个精神使欧洲人“控制天空、到达星球、擴張到地球的四角”。^⑦ 所以巴拉克劳的說法虽然先后有出入，但总的說来，他所指的欧洲历史特点无疑是精神的特点。既然欧洲历史的特点是精神的特点，則这个历史发展的步骤也必然是精神发展的步骤。在“中世纪的历史回顧”及其它各文中，巴拉克劳对于欧洲历史的发展步骤也曾有所闡述。他撇开三世紀前

① 前揭書，頁35，41。

② 前揭書，頁185—202。

③ 前揭書，頁202。

④ 前揭書，頁50。

⑤ 前揭書，頁192，193，201。

⑥ 前揭書，頁53。

⑦ 前揭書，頁48，166。

由一个德国学者克勒尔 (Keller 或 Cellarius) 定下来的三分法 (即西欧史学中通行的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法), 提出欧洲历史应当分为四个阶段。^① 自大体而论, 所谓第一阶段是包括古典文明的终结、伊斯兰文化的西传, 第二阶段包括政教之争的思想冲突和哈斯金斯 (C. H. Haskins) 曾经详加讨论过的所谓“十二世纪文艺复兴”, 第三阶段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前后, 第四阶段则包括启蒙时代唯理主义的传播。^② 从上述各个阶段的内容, 可见他的分期法是以人的精神状况为根据, 四个阶段也就是欧洲历史精神的四个发展步骤。这四个步骤以逐步导向世俗的和理性主义的探求精神为主流。有了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主流, 就能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控制天空、到达星球、扩张到地球四角”的理想。这就是巴拉克劳为过去欧洲历史所勾勒出来的全然是唯心主义的图景。

在文集的第一篇论文里, 巴拉克劳还提到目前的历史也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将引向何方, 他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说明。可是从全部文集所表现的主导思想来看, 他对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他相信自成一体的历史有始有终, 自生长以至于谢灭。他曾把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比为欧洲历史的中年, 又说欧洲历史已经度过了春天和夏季, 现在正处于九月来临的秋天。^③ 不用问, 中年以后是颓唐的晚景, 秋天过了是冬季, 欧洲下一阶段的历史也就必然是衰落和死亡。在这一问题上, 巴拉克劳和传统史学也是针锋相对的。传统史学相信欧洲的历史进步无穹, 巴拉克劳却认为它的盛时已过, 接着来临的将是衰飒的冬天。这显然是斯朋格勒和汤因比学说的翻版。

我们在前文曾经说过, 巴拉克劳的思想不可能完全脱去西方传统史学的窠臼, 他在各个方面都浸透唯心主义。他虽然承认欧洲历史必须包括东欧, 但是从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 不难看出他仍然以西欧为欧洲历史的主干。他的四分期法就完全是从西欧着眼的, 所谓欧洲思想的发展其实就是西欧思想的发展。他又以此为标准, 高谈俄国和西欧的不同。他说, “俄国没有经历过十一、二世纪之间对全部西欧起决定影响的巨大的精神激动” (按其意是指西方政教之争中的思想冲突), 也“没有参与从十二世纪经过彼特拉克时代直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对政治思想和其它思想方面的刺激”, 而“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和旧教改革两大革命运动……又止于俄国的边境”。^④ 因此, 他认为, 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没有经历上述任一中间阶段就进入启蒙运动, 也没有发展启蒙运动的真义所依据的社会基础”。这样突然改变的结果, 就形成所谓“俄国生活中可悲的二重性”, 形成西方派和守旧派的论争, 直到十九世纪延续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对立。^⑤ 巴拉克劳的这些议论, 充分说明他是戴着西

① 前掲書, 頁61。四階段為: 一、自日耳曼人的史前期至公元900年, 二、自公元900年至1300年, 三、自公元1300年至1789年, 四、自公元1789年以迄現在。

② 前掲書, 頁12, 又頁159。这里巴拉克劳略去了宗教改革, 說三大轉折点是: 晚期古代, 十一世紀的“偉大革命”即政教之爭, 十八世紀的启蒙运动。巴拉克劳不重視文艺复兴, 在這一點上, 他也是做翻案文章的。

③ 前掲書, 頁160, 238。他在頁160又說晚期古代相当于欧洲历史的誕生, 十一世紀則为欧洲历史的成年。

④ 前掲書, 頁188。

⑤ 前掲書, 頁195。

欧的眼鏡看东欧，因而不可能脫去傳統的西欧中心論的牢籠。他对东西欧历史關係的討論，也始終是一片唯心主义的迷霧。同，是由于思想傳統；不同，也是由于思想傳統。为唯心主义史觀說教的巴拉克劳，不可能、也絕不愿意、从根本上說明这一問題。

从根本上說明这一問題，非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发展的理論不可。东西欧在欧洲历史上之所以不可分，是因为它們同是在羅馬奴隶社会的廢墟上，吸收了斯拉夫人或日耳曼人所帶來的公社因素，建立了欧洲的封建制社会，又从封建制社会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目前，則是一个已經进入、一个即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科学的入門常識，也是东西欧在欧洲的同一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共同点。然而正是在这入門和根本之处，显示历史唯物主义和巴拉克劳學說不可調和的对立，也显示巴拉克劳在这一問題上的蒙昧和混乱。只有明确了东西欧历史的这一根本共同点，然后才能进而討論它們之間的差異，而巴拉克劳就恰恰不是这样。巴拉克劳以斯基的那維亞民族为例，論証斯拉夫民族在稍晚的时期参加了欧洲历史，这完全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謬論。因为斯拉夫各族和日耳曼各族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接受羅馬后期社会发展的影响，形成欧洲的封建社会，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同的問題。它們的不同，就其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段历史而論，是由于它們虽同处于欧洲的封建社会之中，但城市的兴起、城市市民階級的形成、以及与此相隨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发展，却有先后、快慢、充分和不充分的差異。巴拉克劳所津津乐道的直到十八世紀启蒙运动的几个思想发展阶段，除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政教思想冲突中含有教俗两界封建主义的矛盾外，都是西欧城市兴起以后，在上层建筑方面反映市民階級意識及其要求的几个发展阶段。由于西欧自封建社会以来城市发展較早、也較为充分，因之反映市民階級及其血裔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上层建筑，从所謂“十二世紀的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紀的启蒙运动，都有远較东欧为显著的表现。然而这不等于是說，东欧历史在較晚和較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沒有类似的发展。巴拉克劳在这一方面不作研究，硬說彼得大帝的改革是突然进入启蒙时代，显然缺乏充分的根据。事实上，彼得大帝的改革以及俄国之接受启蒙思想，远不是沒有相应的、而且也是和西欧类似的、社会发展做基础。在这里，我們只要举出一項資料就可有助于对这一問題的了解。根据雅可夫柴夫斯基(В. Н. Яковлевский)的研究，十七世紀后半俄国城市的工商业已有相当的发展。“由盐农出身的斯特罗加諾夫家，在烏拉尔拥有碳酸鉀制造場与盐場，并进行巨額的商业交易，他們有15,000自由工人和农奴工人。莫罗佐夫家拥有制鉄、制革、制酒、制磚、織蕪等工厂以及磨坊及漁場……在他們的碳酸鉀工厂里每年制造出将近1,700博契卡的碳酸鉀，出售后可得24,000卢布的利潤”。虽然商业利潤还会轉化为地租，但与此同时，“國內貿易基本上是由生产者自己进行的时期，大約在十七世紀中叶就結束了”。商业資本不仅活跃于國內外市場，而且还滲入制造場和工厂。●这些經濟上的发展，說明彼得大帝的改革要求以及俄国之接受启蒙思想，都有其同于西方的客觀社会基础，絕非如巴拉克劳所想象的那样，是突然地、一无社会准备地由西方隨手引进来的东西。巴拉克劳把十八、九世紀俄国西方派与守旧派的爭論看做是无准备地进行西方化的結果，这也是无稽的臆說。在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代表新的階級利益的思想，必然遭到代表旧的階級利益思想的反对。西欧启蒙时代的历史本身就說明了这点。法国的福祿太尔、底迪罗等人有其斗争的对手，俄国

● 雅可夫柴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資本，頁21, 26, 27，中譯本，科学出版社，1956。

的西方派也必然会这样。这是毫不足怪的事情。举出这样的事情只有证明东西欧历史的发展基本相同，在步骤先后快慢上、在具体的细节上有差异，却不能证明东欧是在不同的基础上突然进入启蒙时代、接受西方的思想。巴拉克劳既不能从与西欧基本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明俄国从西方接受启蒙思想，当然也不可能从同一角度说明俄国从西方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的发展。于是他只有重复汤因比不值一驳的滥调，污蔑马克思主义一旦到了俄国就成为承袭东正教传统的新的弥撒亚精神。①

巴拉克劳同样不能理解历史是各个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因之他也不可能正确批判西方传统史学中的一线发展论。西方传统史学把整个人类的历史视为一线发展并最后达于西欧近代文明的顶峰，这当然是荒谬的、充满自大狂的。但是这一思想承认历史不断发展、承认后一阶段的历史总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就说明其中有可以肯定的合理的因素。巴拉克劳不但看不见这些合理的因素，用唯心主义的论点把一线发展论全盘否定，而且还抬出历史周期论，说历史有始有终，象有机体一样逃不脱生命的周期。这就不难看出，他的学说比传统西方史学更唯心、更多一层宿命论的色彩，在本质上是一丘之貉。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理论，虽然他很少正面对垒，但在有些地方，却存心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一线发展论混为一谈，然后一并否定。②他这样做的用心，我们无须分析，可以一目了然。所以巴拉克劳之所谓“重新定向”，他之所以反对西方自十九世纪以来的传统史学，绝不意味着这是学术上的真理之争，是科学与伪科学之争，而是资产阶级反动史学的内鬭。我们在前文中列举巴拉克劳的主要论点，目的只在指出他和西方传统史学之间发生了那些转变。明确了二者之间的转变，然后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个转变的时代意义。

三

朗克学派形成于十九世纪初叶，发展和扩大其影响于十九世纪的中叶和末叶，一直到二十世纪。在这个时期里，欧洲资本主义正当蒸蒸日上，并迅速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当朗克发表第一本著作的时候（1824），早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已有将近六十年的历史，标志工业革命主要阶段的煤、铁、机械工业和近代化交通技术设备的发展，也即将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推向从未有过的高峰。与此同时，拿破崙的战争时代已经过去，短促的法国霸权也随之结束。维也纳会议的结果，形成了各大国之间的新的均势。德意两国的民族统一运动，正在露出不可忽视的趋势，迟早要成为维持欧洲均势所必需估计的重大力量。在欧洲以外，十八世纪英法两国在美洲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已成定局，美国的力量还没有起来；东方的古国印度和中国，一个已经门户洞开，西方的殖民势力可以予取予求，一个则正处于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之下，濒临西方入侵的前夕。至于其它地区，也无一不为西方殖民掠夺的阴影所笼罩。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西方资产阶级，对其自身力量的成长和稳固，这一力量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影响、作用及其发展前景，自然会形成强烈的信念，会要求通过各种中介加以宣扬，为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鸣锣开道。因之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就必然成为这种中介之一，它必然会反映和宣扬处于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意识。朗克学派之诞生，不论从其诞生的时间以及其所

① 前掲書，頁199；A. J. Tynbee, *Civilization on Trial*, 頁182—183。

② 前掲書，頁225。

体现的历史思想而论，都不是偶然的现象。所谓西欧中心、自我调节的权力均衡，在实质上都是由西欧资产阶级基于其自身利益而定下来的历史命题。朗克的作用不过是选择足够的史料，论证这个既定的命题，并为之披上一件科学方法的外衣而已。

在朗克的晚期及其身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有了更高的发展。自十九世纪的中叶以迄末叶，英、法、德等国的煤铁产量逐步上升，机器工业跟踪发展，近代化的交通设备也腾踴而起，汽輪、铁路日益形成繁密的运输网，缩短了陆上和海上的距离。这些国家不但输出商品，而且输出資本。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把资本主义推向帝国主义阶段。于是从一八七〇年以后，西方各国間再度掀起殖民地爭夺的浪潮。非洲被瓜分，亚洲若干未被侵占的地区及独立国家，或則被繼續侵吞，或則被划入势力范围。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商船、砲艦，馳逐于世界上的各个海面，他們的語言、文化、生产技术、教育制度、政治組織形式与制度、生活方式等等，傳布到世界各地，并为这些地区的社会上层所接受。当此时期，欧洲的资产阶级可謂志得意滿。他們在政治上已經利用各种条約、協議保持了既得利益，在一个較长的时期里避免了彼此之間的大規模战争。在经济和文化上，他們以为已經登临人类有史以来不可企及的高峯。他們以优越的人种自命，視受其剝削宰割的殖民地人民为“白种人的負担”。在他們看来，世界已經是欧洲的世界，整个世界已經欧洲化，世界的命运必須取决于欧洲，而欧洲又是以西欧为主脑。十九世纪后叶资本主义在欧洲历史上的新的发展以及伴随这些发展而产生的西方资产阶级充滿自大狂的思想意識，不可避免地要在历史学領域里得到反映。接受朗克学派体系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史学家，也就認為这一切都合乎朗克的邏輯。以欧洲为范围的权力均衡，現在扩大为以世界为范围的权力均衡；从古典时代直至近代欧洲的一綫发展，現在扩大为从全人类的过去文明直至欧洲文明的一綫发展。牛頓的物理学可以引为机械主义的权力均衡論的依据；一八五九年出版的达尔文“物种原始”，則又可用來为一綫发展論張目。他們对于欧洲历史的近乎狂热的信心，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所經歷的这一发展和野蛮擴張的时代。那些追随朗克傳統、埋首于档案資料、只对窄小的問題进行专门研究的部分史家，虽然对通史这样的大題目避而不論，但其内心也接受这样的假定：即人类的历史問題已經解决，以欧洲为中心的无穹进步已經是不可移易的准則，历史家只要根据新发现的客观材料，对若干枝节問題修正补綴，使历史的写作更謹严、更客观，也就够了，此外已經不存在可供历史家討論的問題。所以一面是誇大狂的通史体系，一面是煩瑣考証的鉅訂之学，这在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傳統史学中是絲毫也不令人感到矛盾的事情。

然而历史上一个阶级的命运是受客观規律支配的，西方的资产阶级并没有青春长駐的魔朮。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爆发为使其自身大遭削弱的第一次世界战争。这场燒遍欧洲的战火还没有停息，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在一个大国里成功地夺取并穩固了政权。第一次大战以后，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经济恐慌、失业、罢工，波濤相逐，不断地侵蝕和震撼着资产阶级的統治力量。过去曾經高視闊步、以整个世界为其囊中物的西方资产阶级，迅速走向沒落的道路。这种沒落的景象，在历史学中开始反映为斯朋格勒等人的思想。然而资产阶级諱言沒落，其御用的正宗史学家也不承認斯朋格勒等的思想具有历史学上的意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的衰落景况更其表面化了。由第一次大战殘留下来的三个资本主义大国，只剩下一个可以勉强充数的英国，而英国也还是要仰承美国的鼻息，依靠美援。以英国而犹如此，其它西欧国家更不堪一問。可是在东欧，却出現了强大的苏联，出

現了一羣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欧洲而外，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又到处崩裂，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一跃而为左右世界形势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形势的发展，不得不使西欧的资产阶级承认他们宰制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自前一世纪以来西方传统史学根据其阶级意识而描绘下来的欧洲历史，在今天也已不得不成为可笑的梦魇。于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从正宗史学中跳出来的巴拉克劳，大谈西方史学之必须“重新定向”。资产阶级的历史遭遇改变了，它的史学调子也跟着改变，这是必然之理。今日的巴拉克劳，其实也和当年的朗克一样，其所讨论或阐明的历史命题，也是由资产阶级所经历的时代决定的。所不同者，朗克奏的是爽朗的进行曲，而巴拉克劳则是沉吟着彷徨无路之歌。

巴拉克劳当然不可能看到这是由于社会阶级的力量发生了变化。他所看到的，是西欧国家已经远不是若干年前的情景，而西欧以外的力量却又如此地使他感到咄咄逼人。因之，在欧洲范围内，他第一次看见了东欧的力量、特别是今日苏联的力量；在欧洲范围外，他也看见了广大世界的力量。他不仅承认今天世界形势的决定权已经操在西欧和欧洲以外力量的手里，而且也承认，自中世纪以来，如果不看到亚洲、阿剌伯、拜占廷和斯拉夫民族的影响，不看到欧洲与广大世界的联系，就无法理解西欧的历史。^① 传统西方史学把近代西欧看做是对广大世界发展的决定者，广大世界好象总是处于受动的一面；他却相反，把西欧看做是广大世界影响的接受者、被决定者，而且认为今日觉醒的亚洲，“在不久将来，就要把欧洲抛在后面”。^② 传统西方史学以为人类历史发展到最高的时代就是欧洲或欧洲化的时代；他也与之相反，说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将是“太平洋时代”。^③ 他慨然于四个世纪以来欧洲建立权力均衡体系的结果，是把它分裂为许多又小又弱的单位，而在欧洲以外，则日益形成把广大领土置于统一控制之下的强大国家。^④ 他引述战后德国史家路易·戴希奥（Ludwig Dehio）的议论，说西欧为了保持权力均衡，一次又一次地招引和依靠外来的力量，击败欧洲大陆企图称霸的国家。拿破崙的法国是依靠英俄两国打败的，希特勒德国是依靠苏美两国打败的。其结果是西欧维持了一夥疆土很小、资源不足的国家之间的均衡，西欧和欧洲以外却出现了远远走在前面的幅员广袤的大国。于是曾经被朗克视为一付奇妙的、能够自我调节的、并且保持欧洲历史永不破败的权力均衡的机器，在巴拉克劳的眼里，却成为促使今日欧洲趋于衰落的祸根。巴拉克劳预言：“到了二十世纪后期或二十一世纪，欧洲将注定会享有（如果这个字眼是用对了的话）类似于它在十八、九世纪曾经加于非洲、部分亚洲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地位”。^⑤

在目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抱有类似见解的绝不止巴拉克劳一人。汤因比已经是人所共知，不用再谈。除此而外，德国的韦布尔（Alfred Weber）、美国的斐西尔（Eric Fischer）

① 前揭书，页177。巴拉克劳在这里把“欧洲和外在世界的联系”看做是形成欧洲历史的“决定因素”，这是走到另一极端的错误说法。但从这点上，也可看出传统史学那种自我中心式的信念已经在他的思想里不存在了。

② 前揭书，页217。

③ 前揭书，页207。

④ 前揭书，页126，183，208—209。

⑤ 前揭书，页208。

波蘭的赫勒基(Oskar Halecki)等等,都認為欧洲历史已經面临沒落的命运。❶ 巴拉克劳在好些文章里都引这些人为同調。从他对这些人的引述来看,西方資產階級史学界显然已染上一种对欧洲历史前途无望的时疫,而且看来这个症候还无药可医。英国的巴克尔(Ernest Barker)把挽救欧洲文明的希望寄托于在欧洲实行联邦主义。❷ 但是巴拉克劳不相信,他說看不出联邦主义怎么会解救欧洲内部的危机。❸ 还有不少人把希望寄托于美国,特别是近年的美国資產階級史学家,以为有了美国,就不愁欧洲历史会中断。然而巴拉克劳对于这帖药也頗不热心。他說美国近年的历史編纂学是“岸然自大”,忽視了欧洲历史和美国的不同,貿貿然就以延續欧洲文明为己任。❹ 巴拉克劳不但不同意美国历史可以为欧洲历史的延緩,而且即以美国历史自身而論,他也不以为会有什么美妙的前景。他在文集里不惜以較长的篇幅引述了一个年紀較輕的美国史学家韦白(W. P. Webb)的意見,并在大体上認為有理。韦白的意見是:美国由开发边地而帶來的全盛时代已經过去,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也已被大企业制度所吞沒,未来的时代不是进步而是下坡。❺ 巴拉克劳既然在大体上認為韦白的說法有理,可見他并不以为美国可以挽回欧洲历史的衰亡,欧洲也不能从美国找到历史的出路。在他的文集里,有一两处曾隱約提到共产主义可能是欧洲的前途,也說到后人之后視苏联革命,可能会如今人之視法国革命❻。但总的說来,巴拉克劳对于这一全人类今后历史出路的问题,是不敢深入分析的。他不可能、也不愿意、作进一步的認識。一个垂死的战敗者,看到他所面临的敌对力量是可能的,但在他的内心,却不会甘于承認征服和代替他的正是这个力量。所以当巴拉克劳最后綜述他的观点时,终于断言“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梦想的失敗”。❼ 他的反动階級意識和感情,支配他看不出未来历史的方向,因而他也就不能为欧洲历史找到任何出路。

唯其如此,从巴拉克劳的笔下,我們就可以随处看到一种茫然的末世之感。他把自宗教改革以迄法国革命时期的欧洲民族国家比之于希腊的城邦、把巴黎比之于雅典、把今日的倫敦和紐約比之于羅馬和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比之于第三次布匿战争、目前西方統治階級的各种改良比之于革拉古兄弟的徒劳无益的改革,并說今天的欧洲,正如羅馬之临近凱撒的时代。❽ 这些不倫不类的比喻,和湯因比的理論如出一轍,在實質上是为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国家”說教。但就其体系本身的邏輯而論,当一个文明走向“世界

❶ A. Weber 著有“Abschied von bisherigen Geschichte”, 1946,英譯本为“Farewell to European History”。E. Fischer 著有“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Age”, 1943。O. Halecki 著有“The Limits & Divisions of European History”, 1952。这些書見于巴拉克劳書中的引述。

❷ E. Barker 等, The European Inheritance, 卷三, 頁348。

❸ G. Barraclough, 前揭書, 頁164。

❹ 前揭書, 頁172。

❺ W. P. Webb 著有“The Great Frontier”, 1952。主要論点已为巴拉克劳所引述, 見前揭書, 頁139—143。

❻ 前揭書, 頁167; 201。

❼ 前揭書, 頁234。

❽ 前揭書, 頁233, 234。

国家”，却是预示它的末日的开始，罗马的历史就是以走向帝国而宣告终局。所以巴拉克劳说，处在今日欧洲的人们，正如在公元前一一三年时一个能够洞察未来的罗马人一样，已可看到那即将取欧洲而代之的新文明的矍矍面貌。● 湯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里，有时还勉作壮语，说“西方文明的子孙”还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巴拉克劳却连这点都不敢相信。他引用斯朋格勒的话说，“没有一个文明可以自由选择它所必经的道路”。⑤ 这就等于明白宣告：欧洲历史除死亡而外，已经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对于他所认为的欧洲历史的如此暗淡的前途，巴拉克劳在表面上是颇能保持一个学者的宁静态度的。他说，人生的节奏必然是由少而壮、由热情而恬静、由活跃而沉潜、最后以致于死，知道了这个道理并不是悲观。但是在有一篇文章里，他也终于宁静不了。他说：“一九四五年，当战争的烟雾消除了，在战场的一角，发现一个躺着的、裸露的、被破坏了尸体，这就是我们曾如次深知的古老和熟悉的欧洲……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们知道它已渐渐经不起风露……但是我们暂且息它，丝毫没有介意那点偶生的白发；到了发现这具委诸泥土的被破坏的尸体，这真是一个可怖的震动……”。⑥ 仅从节录下来的这些笔调来看，与其说这是史学论文，毋宁说是沉郁的輓辞。不管巴拉克劳怎样貌为超脱和明智，也掩饰不了籠罩于西方史学界的那种末世的哀愁。

巴拉克劳当然是不甘心于欧洲会这样没落下去的。他很想振颓起废，负起一个史学家对于他所属社会的责任。在文集的头一篇文章里，他开宗明义，反对为历史而历史，痛切批评西方传统史学之空谈客观，不问现实。他抬出其前辈阿克屯(J. Acton)的老话，说“对已往[历史]的知识是行动的工具”，必须切合实用。⑦ 作为资产阶级史学家，巴拉克劳自有其另一种的阶级感情。他之所以指出“重新定向”，也就是想要为欧洲历史找到一条出路。然而他力不从心，除了叫人以泰然对待自然生死的态度来对待欧洲历史而外，什么也没有探索得到。比他较早一辈的英国史学家布莱(J. B. Bury)，还坚信“历史是不折不扣的科学”，但是他“重新定向”的结果，却承认历史是相对主义的，“并非打开生命之谜的锁钥”。⑧ 西欧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决定巴拉克劳是如此地想有所作为，却又如此地彷徨无计。

然而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坚决反对欧洲历史即将死亡的谬论。即将死亡的不是欧洲历史，而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历史。欧洲的无产阶级将会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一样，为死亡中的资产阶级掘墓，准备埋葬它，然后创造欧洲历史的全新的一页。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

● 前揭书，页237。

② 前揭书，页236。湯因比在“A Study of History”中所云，参看 Somervell 节本，页254。

③ 前揭书，页154。

④ 前揭书，页15，引文中“历史”二字系作者注入。

⑤ 前揭书，页25。